



红色音乐文化的河北乐章

□ 孙英臣



红色音乐文化在红色文化中独树一帜，那美妙动听、感人至深的红色音符和旋律，不仅承载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印记与集体记忆，而且凝结着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价值理念与道德情感。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红色音乐文化也是如此。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仿佛让人感受到粗犷豪放的陕北风扑面而来；一曲《浏阳河》，又让人沉浸在优美婉转的湖湘风情之中；而一曲《十送红军》，则让人如同置身1930年代的赣南，感受留恋期盼、难舍难分的军民鱼水情……在红色音乐文化磅礴浩瀚的交响诗篇中，河北乐章以其独特魅力、突出贡献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值得我们欣赏、品评。

在红色音乐文化的河北乐章里，跳动着一串串闪光的姓名——张寒晖、曹火星、罗宗贤、安娥、田光、李群、唐河、生茂、魏风、施万春……回荡着一首首动人的乐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军民大生产》《八路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英雄赞歌》《我是一个兵》《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里仅撷取几首经典作品，回眸它们诞生的岁月、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如泣如诉、悲愤激越的名曲《松花江上》，表达的是东北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诞生在当年集聚了几十万东北军和流亡难民的古城西安，词曲作者则是河北人、共产党员张寒晖。

张寒晖（1902—1946），原名张兰璞，字含晖，出生在顺直省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西建阳村一个衰败的书香之家。1925年，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返回老家担任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教学生唱歌，编演秧歌剧，宣传革命思想，努力把这所学校变成播撒革命火种的阵地，进而点燃了定县东部革命的星星之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寒晖根据民间曲调《满江红》填写抗日歌曲《告我青年》，号召劳苦青年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1935年9月，张寒晖应邀赴西安，到陕西省立西安第二初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员。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整整4年，几十万流离失所的东北军和难民在西安街头流浪徘徊、啼饥号寒。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日军的罪行，听他们倾诉思亲思乡的情感。目睹他们凄惨的遭遇，耳闻他们痛苦的呼号，张寒晖悲愤交加，谱写了《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首歌的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如泣如诉、亦悲亦愤，令人愁肠欲断、声泪俱下。歌曲激越高昂，于悲痛中蕴藏着抗争的力量。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在途中，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使围观的群众无不失声痛哭。

1937年，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一文中写道：“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

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张寒晖因为创作了《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等风靡全国的优秀歌曲，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气势磅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的歌曲，自1939年起，便回荡在祖国的山川大地，萦绕在一代代革命军人的心头。

这首歌原名《八路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期间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了颁定军歌的命令。这首军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郑律成，词作者是来自河北省的著名诗人公木。

公木（1910—1998），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原名张永年，公木是其笔名，出生在直隶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直隶正定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学生时代，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因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两度被捕入狱。1937年七七事变后，公木投笔从戎，经林伯渠介绍奔赴晋绥抗日前线，在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任宣传股长。1938年8月，他受党组织委派西渡黄河，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及毕业，公木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作曲家郑律成在该科任音乐指导，二人合住一个窑洞。

1939年春，洗星海、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迅即唱遍全国。郑律成大受启发，激动地对公木说：“咱也搞一部大合唱吧！”公木问：“什么大合唱？”郑律成兴奋地道：“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公木听罢，热情响应。他仿佛重返硝烟弥漫的战场，眼前是威武雄壮的队伍，耳畔是冲锋陷阵的号角。他激情澎湃、灵感迸发，挥笔立就、一气呵成，不到一周时间就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等8首歌的歌词。公木每写成一篇歌词，郑律成便拿去作曲。二人互相启发，配合十分默契。1939年冬，《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首演。很快，这首具有排山倒海般革命气概的进行曲，便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成为激励广大军民团结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

1942年5月，公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门口，周扬向毛泽东介绍公木是《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写得好啊！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如今，这首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革命精神的气势磅礴、豪迈雄壮的军歌，已经成为人民军队军威的象征。

“团结就是力量”

1943年，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

地相继展开残酷的“清乡”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在一些地区不断地制造摩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犹如激荡人心的号角，鼓舞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侵略者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牧虹和卢肃都不是河北人，但这首歌的诞生地是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

2021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的回信中说：“78年前，《团结就是力量》从你们那里唱响，成了亿万人民广为传唱的一首革命歌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你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943年夏天，一支由文艺工作者组成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当时，包括平山县在内的晋察冀山区老百姓特别苦，给地主纳租特别重，因此提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庄村后，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战斗，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民渴望生存、要求民主、团结抗战的力量。北庄村群众的团结之心、团结之力给了卢肃和牧虹极大鼓舞，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为了配合减租减息运动，他俩就在老乡屋后的山坡上，用时3天创作了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由于剧情结束得有些突然，缺乏终止感，他俩又综合大家意见增加了一个幕终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歌曲的主题思想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形成钢铁般无坚不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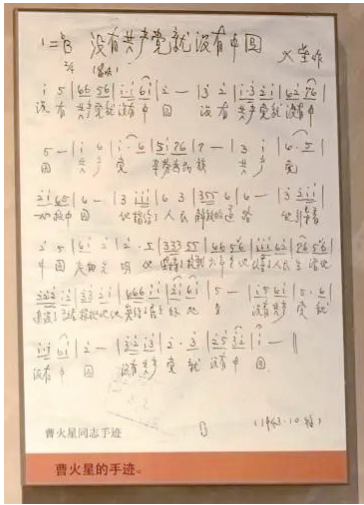
这首歌开门见山，起句就点明主题：“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其节奏铿锵有力，其情绪慷慨激昂，其气势威武雄壮。这首歌没有采用通常的七声音阶，而是充分运用了中国特色五声音阶的素材，因而具有浓烈的中华民族音乐风格，特别是接连向上的六度大跳进，形成了雄壮有力的磅礴气势。整首歌只有68个字，但却迸发出了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表现出八路军和老百姓团结抗战的坚强意志，成为团结中华民族奋勇抵抗日寇侵略的号角，给全世界法西斯罪恶势力敲响了丧钟。

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能够穿越时空。《团结就是力量》唱响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因此，这首歌诞生以来，唱响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妈妈教我一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从妈妈心头飞出，这支歌伴随她走遍祖国山河……”这首歌叫《妈妈教我一支歌》，歌里唱的那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一首歌来歌唱另一首歌，而且这两首歌都红遍大江南北，传唱不衰，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这里要介绍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作者是来自河北省的著名作曲家曹火星。

曹火星（1924—1999），原名曹峙，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七七事变后，少年曹火星抱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投身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1938年2



月，他参加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同年4月调平山县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宣传队（即铁血剧社，后更名为群众剧社）任演员、音乐队队长。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多才多艺、酷爱音乐的曹火星运用民歌小调填上新词，进行演唱或教给群众演唱。1939年冬，他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音乐系学习。在抗日歌曲的熏陶、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吕驥、卢肃等名家的指导下，他进步很快，结合中心工作陆续独立创作了《上战场》《造村长》《春耕忙》《万年穷翻身》《春天里喜洋洋》等一系列曲调明快、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

1943年秋，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另外两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翻山越岭来到堂上村。堂上村位于房山县和涞水县交界处的霞云岭上，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也是个抗日堡垒村。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声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年轻的曹火星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充满激愤。他深深明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四万万同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身而出，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针对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无耻谰言，曹火星脑海里升起一个鲜明的创作主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激情满怀、心潮澎湃，坐在老乡的土炕上边写边唱，经过反复修改，创作了不朽名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有一天，毛泽东听女儿李讷唱这首歌，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不科学、不准确，因为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因此应该在“中国”前面加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后来，这首歌就正式定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戴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鼓舞、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进。正如《妈妈教我一支歌》里唱的那样，“这支歌飞进幼小心田，这支歌世世代代永不落！”



在北方，秧歌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各地风土民俗不同，秧歌种类也不同。东北有大秧歌、踩高跷，山东有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我老家在陕北，秧歌种类更是丰富多彩，有安塞腰鼓、靖边跑驴，还有搬水船、抬花轿、赶场秧歌、伞头秧歌、九曲秧歌等。无论是节庆，还是农闲，秧歌都是陕北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

不管是哪种秧歌，大都包含了“秧”字，这表明秧歌与农耕生产密不可分，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儿时记忆最鲜活的部分，大概就是正月里的秧歌。乡民们对秧歌极其重视，每个村都会组织秧歌队，由本村最德高望重的人领头，来负责安排秧歌队的组织工作，包括鼓乐手、骨干演员的召集。秧歌队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伞头”，“伞头”可说是一个秧歌队的灵魂人物，不仅要扭得好、走得好，还要嗓音好、编词好，能随机应变，即兴创作秧歌词。这样的全能人才并不多，有时本村没有，还得到外村去请。

组好了秧歌队，先要排练多天，待起场后，一般是沿袭谒庙、转院等活动，谒庙就是敬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最热闹的，是挨家挨户的转院，转院最考验“伞头”，他需要熟悉各家的情况，还要随机编词，既符合这家的特点，又能融入吉祥话。有时候，秧歌队还要出村演出，遇到灯场就“打彩门”，或者搭起台子，在一个地方“扎场子”演出。

秧歌的精髓是一个“闹”字。陕北人不说跳秧歌，也不说舞秧歌，而是说闹秧歌。无论是赶场秧歌，还是转院秧歌；不管是表情，还是舞步，演员们总是热情奔放、极尽夸张。踢场子、甩扇子，舞起来、闹起来，浓墨重彩的妆容，华彩鲜艳的服饰，一场场热闹的秧歌，让父老乡亲们暂时忘记了一年的辛劳和烦恼。秧歌队所经之处，村庄的人们，便扶老携幼，跟着瞧、追着看，生怕错过每一个传神的表情、喜庆的唱词，还有精彩的动作。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革命岁月中，陕北的秧歌曾扮演重要角色，发挥过重要作用，陕北秧歌的名气，超越了黄土高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4年年初，谢觉哉日记中多次记述在延安看秧歌，先是元旦期间有保安处秧歌队表演了《秧歌齐唱》《白猴村》《老太婆回家》《两个世界》，后来春节期间又有多支秧歌队来演，“不及遍看，演的节目均精彩。”他感慨，秧歌由过去偏技术性的踩高跷转变为故事性、教育性的剧目了。

1946年农历正月十五，毛泽东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刻有“人民救星”的大匾，这份礼物，是延安川口区六乡碾庄的农民们自发送出的，并且是由一支农民秧歌队敲锣打鼓送去的。毛泽东对六乡人民表示感谢，并祝六乡人民夺取更大丰收。接着，在王家坪的大礼堂场院，农民秧歌队表演了《兄妹开荒》《二流子王三宝转变》等，毛泽东饶有兴致地看完了节目，还与秧歌队合影留念。

延安时期秧歌的转变，是与当时文艺为人民的政策导向相一致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红火秧歌闹起来

□ 韩伟

中提出，文艺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艺术家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鲁迅艺术学院很快提出要组织一个民间形式的宣传队，在陕北流行的秧歌就成为焦点，一个百余人的大秧歌队被组织起来，排演了《打花鼓》《莲花落》等秧歌小场子。1943年的元旦、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又丰富了演出内容，演出了《赶毛驴》《推小车》等节目，并且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杨家岭上进行了表演，轰动了整个延安，有的群众跟着秧歌队走了三十几里路，连看几场，舍不得离去。毛泽东、谢觉哉等看到的秧歌，正是“新秧歌运动”以来的成果。由于艺术家的整理和创造，使秧歌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以其嶄新的面貌出现。它在根据地为宣传群众、鼓舞抗战、开展大生产以及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活动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陕北的小山村里，年轻人逐渐稀少，万人空巷的盛装秧歌舞已经难见，但这并不意味秧歌从人们生活中逐渐逝去，它随着人口的流动，来到县镇，来到都市。在广场上，在街巷里，只要陕北人聚起来，就能来上一场热闹的秧歌，不讲究装扮，也不追求步伐，只要你喜欢，就能跟着扭起来。很多地方，它已经成为广场舞的重要类型，也是陕北人社会交往、消解乡愁的最好途径。

秧歌来自人民，最终又把欢乐回馈给人民，它承载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这大概就是其广受热爱、长盛不衰的奥秘吧！红红火火的秧歌，每逢节庆之日，在陕北，在中国的大地上，都要闹起来！

